

(Li Er's Series)
(of Works)

李洱作品系列

(中篇小说集)

始终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立场
百科全书式描写巨变的中国

李洱：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叙事方式，
以对应我们置身其中的复杂的社会
状况。不管从哪个方面讲，这个时
代的真正的写作，都是探索性的。
其价值，只能在多年后显示出来。

午后的诗学

李洱
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李洱作品系列

午后的诗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午后的诗学/李洱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7.11

(李洱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1-6377-9

I. ①午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58946号

发行人:陈征

责任编辑:丁元昌

美术编辑:丁旭东

书名:午后的诗学

作者:李洱

出版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
印刷: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890×1240 1/32

印张:11

插页:2

字数:195,000

印次: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377-9/I · 5095

定价:39.00元

告读者: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0512-68180628

自序

十年前，有编辑朋友说，愿意编辑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，或者所谓的文集。最近几年，也不断有人这样建议。对朋友的好意，我当然要表示感谢。但是，我却不敢贸然应允。

对自己的作品，我一直缺乏足够的信心。我自认为是个认真的写作者，但是认真只是一种工作态度，它并不能保证你能写出好作品。我也自认为写出过一些好作品，但是它们在我的作品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，我却心中无底。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，就是能抽出时间，对已有的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润色，好像它们还只是一些半成品，不该轻易拿出来示人。

熟知我的读者都知道，我这样说，并非矫情。

我收到过、拜读过很多朋友的作品集、文集。阅读朋友的作品，既是与朋友相处的方式，也是向朋友学习的机会，你可借此知道当代的写作状况。但是说句实话，对这些作品集、文集能有多少读者，我总是不免有些怀疑。以自己的阅读为例，中国作家中，除了鲁迅的文集，别人的文集我确实没有认真通读过。外国作家中，除了加缪的文集，我也没能全都读完。是啊，除了研究鲁迅和加缪的少数专家之外，谁又会去通读他们的文集呢？对鲁迅和加缪这样的顶尖大师尚且如此，遑论对于他人？

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，我对出版作品集，或者所谓的文集，确

实没有太大的兴趣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现在当这套作品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满了不安。

如果你问我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将它们集中出版呢？我想了想，终于找到了一些理由。首先当然因为是出版社的盛情。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出版社，从这里出版的很多优秀作品，曾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，我对此一直深怀感激。对他们的好意，我除了感谢还得接受。其次，我逐步认识到，写作者永远不可能写出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的。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作品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毛病百出，而他们指出的一些毛病，可能有助于你写出更好的作品；对于你自认为的那些失败之作，或许还会有读者认为值得一读。坦率地说，这两种情况都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，这是一种鞭策，也是一种安慰。而我，既需要鞭策，也需要安慰。

这套作品集，除了收录我的小说作品，也收录了我的一些文学对话录、演讲以及随笔。与我进行这些对话的批评家、记者，无疑都是文学的行家。借对话和演讲的机会，我讲述了我对人与事、对文学与时代的一些看法。正是那样的一些看法，决定了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些作品，也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成功与失败。

感谢阅读这套作品集的每一位读者朋友。

李 洱

2012年9月27日

目录

自序	001
午后的诗学	001
遗忘	076
动静	171
光与影	208
从何说起呢	290

午后的诗学

事隔多年，有一天，我和费边谈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时，我们的回忆竟然大相径庭。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在八十年代末，地点是济水河过的小广场。那天的中午，我正和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女人在街上走着，突然听到广场那边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喊叫声。她拉了我一下，说：“闲着也是闲着，咱们去那边听听诗朗诵吧。”那天参加朗诵的人很多，每个朗诵者都得到了足够的掌声和鲜花。费边那天朗诵的是马拉美的《焦虑》，一首描述罪愆、灵魂的风暴和人性的高贵的诗篇。那大概是那天朗诵的唯一的一首真正的诗篇。费边从那个临时搭成的台子上下来，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，有几个大学生拦住了他。“我们最喜欢你念的最后几句，够劲、解气。”他们重复了他们认为“够劲”、“解气”的那几句，意在表达他们是他的忠实听众。有趣的是，他们记错了，他们七嘴八舌重复的“诗句”，要么是费边前面的那个人喊的口号，要么是等不及费边下来

就跳到台子上去的那个末流诗人吐出来的打油诗。费边听他们讲完，脸上浮出了笑意，随即甩出一个警句：“诗性的迷失就是人性的迷失。”在这之前，我已经听说费边是这座城市杰出的诗人，现在看来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和我站在一起的女人，在那个年代大概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。她将一瓶酸奶递给费边，说：“我也喜欢马拉美，不过我喜欢的是他的另一首诗，《纯洁，生动》。”费边咬着吸管的嘴巴松开了。他看着她，一边和她握手，一边说：“你说得真好。爱诗的女人本身就是一首纯洁生动的诗。”这时候，掌声和喊叫声又响了起来，将他的声音淹没了，我只能看见他的嘴在动，却听不清他又有哪些高论。

这一天，我们三个人在河边的悬铃木树荫下聊了十分钟左右。我记得他很匆忙，说他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一下，得先走一步。临走，他给我抄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和住址。“有空儿，请过来说说话。”他说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当时还对我身边的那个女人说了这么一段话：“我喜欢和一流的女人讨论问题，读二流的诗思考问题，写三流的诗表达问题。”他的口才真好啊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用食指推了推眼镜。那是一副茶色玻璃眼镜（这副眼镜我后来没有再见过）。他的鼻梁有点高，镜架搭上去，就像骑士双腿叉开坐在马背上一样。镜框的两边向下垂了一点，使它有点像栖息在树上的鸟那下垂的双翼。

费边的说法与此大不相同。他坚持认为我们是在九十年代认识

的，见面的地点是某个朋友家的客厅。他说：“如果我们在街头见过，并且像你说的那样还聊了那么长时间，那我肯定会记住你，”他还顺便开了一个玩笑，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过目不忘是我的强项。”他说，在朋友家的客厅里，他确实朗诵了一首诗，但朗诵的不是马拉美的作品，而是但丁的《神曲》。他说，他的朗诵没有获得掌声，因为他朗诵完之后，大家都陷入了沉思。

我们都说服不了对方。算下来的，这样的争执大概发生过七八次。这当然没什么意思，因此，我们后来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。不过，在另一个问题上，我们之间不存在异议，这就是，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在一次打猎活动中，成为真正的朋友的。在一九九一年的夏初，费边邀请几个朋友到郊外打猎散心，到出发的时候，那几个人说有事不能去了，结果只剩下了我和费边。那一天，我们漫山遍野地跑，跑得脚底起泡，也没能见到猎物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我们正准备回城，突然看到了一个东西。因为距离远，我们分辨不清它究竟是狼还是狗，我先用微冲打了一阵，接着，费边也手忙脚乱地开始射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手中的打兔枪的枪膛炸开了。幸亏那天我们都装模作样地穿了防弹背心（和微冲一起借来的），幸亏费边没有把脸贴着枪托去瞄准，否则，我们（尤其是费边）非被打坏不可。过了很久，我们才缓过神来。我们互相检查了一下，发现都是只伤了点皮肉，这才把心放宽。“我们和死神亲吻了一下。”费边说。与他这句话同时诞生的，还有我和费边的生死与共的感觉，虽

然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。我们搂到了一起。费边说：“挺有意思，猎物没有打着，自己却差点报销。”我说，这确实有意思很像小说里的情节，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把它写下来了。费边用脚试探着那杆炸了膛的兔枪，说：“要是写到它，你最好让玩枪的人当场做鬼，起码得让他瞎一只眼。”接下来，他又顺便谈到了写作问题。他的话说得精彩，应该记下来：

写作就是拿自己开刀，杀死自己，让别人来守灵。

蜂一张嘴吐出来的就是蜜，我的朋友费边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，就是诗学。他的这种出口成章的本领，我后来多有领教。他并不爱贫嘴。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话，往往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精妙分析，有时候，还包含着最高类型的真理。这使我想起他曾向我讲述过的一本书中的一个有趣的故事：二战时，盟军轰炸柏林的火箭落点，与一名士兵从事性行为的地点，总是发生奇妙的吻合，在性行为和 V-2 火箭之间，仿佛存在着神秘的感应。当然，差别还是有的。对我的朋友费边来说，他既是 V-2 火箭，同时又是那位不断受到惊扰的士兵。

认真回想起来，费边对我们初次见面的时间、地点的说法，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。他确实是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厅里，知道我的名

字的，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。他大概认为，这次才算是真正的见面。

在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，朋友们经常聚会，参加聚会的都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。这帮人拥到谁家，谁家的抽油烟机、排风扇就得忙上一整天。如果打开窗户，让阳光照进来，你就可以发现，烟雾在机器的抽动下，在人们的头顶上飘浮得很快，有如风起云涌。当然抽走和排掉的，还远不止这些，至少还有那个年代特有的颂祷、幻灭、悲愤和恶作剧般的反讽。

这些知识界的朋友，每个都有一套俏皮而又中肯的格言，大多数人，连自己的墓志铭都构思好了。我记得有一天从北京来了一位谈锋甚健的诗人。他是费边的朋友，他在谈到海德格尔的“向死而生”的时候，突然朗诵起了自己的墓志铭，并提醒大家也要具备这种“墓志铭意识”。“用不着提醒，这玩意大家都有。”有人立即不甘示弱地站了起来。这个人怕远来的客人不信，就建议大家都把墓志铭写下来，互相传看一下。他的建议荒唐而有趣，大部分人都抵着膝盖写了，并交到了他的手里。我现在所能记住的，只是我和费边的。之所以能记住费边的，是因为我后来又听他说过几次。那其实是但丁《神曲》里的两句诗：

时间就在这只器皿里有它的根，而在其余的器皿里有它的枝叶。

这一天，在随后的发言中，费边对《天堂篇》中的这两句诗还作了一番解释。就我所知，他后来将这则墓志铭藏到了书架上的一只彩陶里，那是它的一个好去处，因为在费边看来，出土的彩陶就是在时间中扎根的器皿。在一首诗中，费边写道：

空洞的彩陶是满的
它装满了时间
土黄色的纹饰是绿的
时间是它的枝叶

什么都谈，什么都可以拿到这样的聚会上研讨一番。有一段时间，一些搞经济和神学研究的人也加入了这种不定期的聚会。人多了，一般的客厅也就盛不下了，于是大家就移师室外。西郊的一个废弃的兵工厂，成了大家聚集的场所。移步换形，走出封闭的房间来到四周都是原野的大院子里，一些新的话题也就进入了交谈。关于农事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，关于田园和城市的二元对立，人们都谈得唾液乱飞。但待在郊外，终归不是长久之计，因为遇到刮风下雨，事先定好的日期就得变动；一些老弱病残者，骑车跑那么远，每次都累得半死。好在这个时候，一些凑热闹的人已经很少来了，剩下的人，较大的客厅已经装得下了。费边的朋友和同事，一个名叫韩明的人，提出聚会可以放到费边的客厅里搞。他的提议正

中费边的下怀，费边早就想为朋友们多出点力了。费边对大家说，他是个单身汉，母亲住在姐姐家里，自己的住房很宽敞，他完全有能力干好后勤工作。他还表示，他要马上找民工，把客厅和卧室之间的墙打掉，让客厅更敞亮一些。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。最后的那几次聚会确实是在费边的客厅里搞的，费边的后勤工作也干得非常出色。费边后来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我摇身一变，就成了边缘的中心，算下来，那可要算是我的黄金时代啊。”

费边的房子位于这座城市的黄金地段，濒临济水河。虽然济水河是一条鱼虾早已死绝的臭河，但它毕竟是自然的象征。黝亮的河水流动时，形成的小小波浪，和碧海中的波浪仍然具有同一性。就像上海的情侣们喜欢挤到臭烘烘的外滩约会一样，这座城市里的人也常到这里转悠，把这里当成了一个风景胜地。作为这里的长期住户，费边谈起济水河的时候，常常没有多少好话。我们刚移师到费边那里的时候，济水河边正是一副锣鼓喧天、旗帜招展的景象。被组织起来的人们，正在那里疏浚河道，用水泥和石板铺设河床。他们伐掉高大的悬铃木，扩展广场，修建舞榭亭台。这些东西都成了费边的话柄：

这是世纪末最杰出的行为艺术：死马当做活马医，臭椿当做香椿吃。广场是权力的象征，众多的小广场是大广场无数的繁殖。而那些舞榭亭台，只不过是提醒我们，一定要乖乖地逃

避真实的命运。

费边对朋友们说，看啊，这里就是一个观景台，在我这里可以看到现代生活中最荒诞的戏剧。费边的朋友韩明说，自己以前就常来这里看戏，有时看得津津有味，恨不得在这里住下不走。

我们在那里谈亚里士多德，谈米沃什，谈布罗茨基，谈学生们送给阿多诺教授的两样礼品：粪便和玫瑰。布罗茨基的那两句话（我是二流时代的二流诗人，二流时代的叛臣逆子）我就是在那里听到的。费边有一次提到了罗马的罗慕洛斯大帝的逸事，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。这位有趣的皇帝，在代表着新文明的外敌入侵的时候，不事抵抗，只在那里逗弄小鸡。“他是一个对罪恶心中有数并能作出艰难选择的人，”费边说，“在缴械的时候，他盯着那些刚爬出蛋壳的小鸡，心中充满喜悦、寂寞和自由。”费边总能找到这种逸出历史编年史的“本质性”事件，使大家在严肃的讨论中，放松一下神经。有一次，韩明和一个写《论语新注》的人吵了起来。那个人事先强烈要求将自己的新注带来，供大家讨论，可临到出门的时候，却要求派车去接他，韩明是聚会召集人之一，他只好坐出租车去把他接了过来。韩明发现他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“烧得厉害，头昏脑涨”，在讨论中就专和他抬杠。如果不是因为有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的古训，这两个胖子就要像相扑选手那样扭到一起了。费边并不上去拉架，他有办法制止他们。他向别的人提起了一个梦，

世上最有名的脱星麦当娜做的一个春梦。在梦中，麦当娜和罗慕洛斯大帝的现代传人戈尔巴乔夫做爱，在高潮上下不来。“赖莎在旁边吗？”有人问。费边说：“你们可以去问韩明，他知道得比我清楚。”韩明说，他是从录像带上看。他说，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，下次再看的时候，一定会格外留意。韩明顾不上和那个人吵了，他现在忙着给朋友们解释他看到的精彩镜头，并提议大家来讨论讨论那个有趣的梦。话题至此转换了。“世俗欲望”、“大众传媒”与“集体迷幻”、“性的深层本质”，这些词语立即从舌面上跳了出来，蹦上了桌面。就像一群猫见到了被夹住的一只老鼠，每个人的声音，都那么有力、那么欢快。刚才的不快，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
最后那两次聚会，这些精英们讨论的是怎样将思想转化为行动。他们决定先办一份杂志。既然已经到了秋天，到了收获的季节，那就有必要把每个人的思想都收割一下，存到谷仓（杂志）里面。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叫“炒作”的词，像瘟疫一样在社会上流行开了，大家都说，这事要好好操作一下，首先得起一个能叫得响的刊名，然后制定一个有弹性的编辑方针。为了更好更快地把杂志搞出来，有人建议可以请一些有实际操作经验的编辑来一起讨论。这个请人的任务就落到了交际多、门路广的韩明头上。“你可别又领来一堆女人，”一个研究西马的人对韩明说，“这是正事，不能瞎闹。”

好像专门要和那人抬杠似的，韩明那天领来的又是个女人。韩明显然料到别人会偷偷质问他。因此，他的屁股还没有坐稳，就先把那个女人的情况介绍了一番。他说，她曾是一个校园歌手，因为男朋友死了，就主动退学了。

所有与死亡有关的爱情故事，在九十年代，都带有神话的气息，让人忍不住肃然起敬。不信，你看每个人的眼神都很肃穆，包括那个反神话论者。

这是费边后来向我转述的他当时的分析和观察。韩明那套话还真是管用，大家都饶了他。那个女孩在韩明说话的时候，静静地站在那里。她穿着一套印有许多暗红色方格的裙子，像三四十年代的大学生留着齐耳的短发。和韩明的解释相配套，她也显得很悲戚，脸色有如晨霜。如果不是事先规定好了议题，我想，那次聚会的话题就变成爱情和死亡了。

开始给梦想中的杂志起名字了。每个人的肚子里都装有许多好名字、怪名字。起名字是有学问者的强项，可以充分显示大家的视阈、才学是怎样的广漠和不同凡响，大家的脑子转得有多快。每个人露了一手，有人建议叫《远东评论》，有人建议叫《日常生活》。反对这两种命名的人，说刊物不妨就叫做《反对》或《命名》。《反对》也遭到了反对，提出反对的是一个小说家，他建议用

与刊物毫不相干的事物来给刊物命名，比如可以命名为《企鹅》。有人提出可以叫《蛋黄》，有人顺着“蛋黄”的思路往下走，说可以叫《变蛋》……提出来的名字，足足记满了六十四开本那么大的——一张稿纸。作记录的是费边，他用的不是钢笔，而是新买的圆珠笔，以免抒写工具发生缺水一类的故障。在记录的时候，费边的脑子也没有闲着。他在分析、联想、臧否、推敲。“既然可以有各种命名，那就说明它其实无法命名，干脆就叫《无法命名》得了。”他插了一句。

在所有的名字当中，我就觉得《蛋黄》比较有意思。蛋黄可以孕育新的生命。由蛋黄可以想到鸡蛋。任何事物都可以比作一只椭圆形的鸡蛋，它有两个确定不移的焦点。这是个致命的隐喻：一个焦点可以看成是我们占有的事实本身，另一个可以看成是我们对占有的事实的批判。这两个焦点隐藏在脆弱的蛋壳之内，悄悄发力，使你难以把它握碎。

每一种命名都被由才学和视野编织的筛子过了一遍。到后来，筛子上一个名字也没有留下。

龟兔赛跑的现代版本是这样的：乌龟跑出去之后，兔子们说，别急，哥儿们，咱们先在一起分析一下哪个跑道比较合适，速